

“校书如扫尘”有感

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 赵文友

近来校点古籍，颇感繁琐。偶读《梦溪笔谈》，见卷二十五《杂志二》有“校书如扫尘”语，顿觉此真乃知味人语。考此语似源于宋绶，宋绶（991—1040年），宋代赵州平棘（今河北赵县）人，官至兵部尚书，参知政事，卒谥宣献。其子敏求，字次道，官至龙图阁直学士。宋朱弁《曲洧旧闻》：“宋次道藏书皆校三五遍，世之蓄书，以宋为善本。居春明坊时，士大夫喜读书者多居其侧，以便于借置故也。”¹魏了翁《遂初堂书目跋》云：“宋宣献兼有毕文简、杨文庄二家之书，不减中秘，而元符中荡为烟矣。”²清末长沙王礼培藏书处曰“扫尘斋”，即当出於此。

古书经过传抄、刊印，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脱、讹、衍、倒，所以校勘古籍为历代学者所看重。但校勘古籍绝非易事，不仅需要严谨踏实的作风，更需具有扎实广博的学识。古人对此认识深刻，颜之推曾说：“校定书籍，亦何容易，自扬雄、刘向，方称此职耳。观天下书未遍，不得妄下雌黄。”³话虽说得有些过分，却也道出校勘古籍之难。综观古人刻书，其自序中颇多自谦之辞，如“才虑短浅，智识浅薄”，“讹误之处，以待方家指正”等，可见著书刻书何其谨慎。朱彝尊为清初大学者，著述颇多，刻书亦多，且亲自校勘。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引清人蔡澄《鸡窗丛话》云：“竹垞凡刻书，写样本亲自校两遍，刻后校三遍。其《明诗综》刻于晚年，刻后自校两遍，精神不贯。乃分于各家书房中，或师或弟子，能校出一讹字者送百钱，然终不免有讹字。《曝书亭集》中亦不免，且有俗体，可知校订断非易事也。”⁴

校书虽难，但对真正的校勘家而言，未尝不是乐事。北魏邢子才有句校书名言：日思误书，更是一适。颇为校书者所认可，清代校雠学家顾广圻就根据这句话，把自己的书斋名定为“思适斋”。清代学者卢文弨性喜校勘，遇有书籍过手，都要细加丹黄，“嗜之至老愈笃，自笑如猩猩之见酒”，祁寒酷暑不稍间。藏书家黄丕烈在《士礼居藏书题跋记》卷四里说：“余好古书，无则必求其有，有则必求其本之异，为之手校；校则必求其本之善，而一再校之，此余所好在是也。”此外，如朱彝尊、何焯、丁杰、鲍廷博、孙星衍、阮元、吴騫、陈

¹ 朱弁《曲洧旧闻》（知不足斋丛书本），卷4。

² 尤袤《遂初堂书目跋》（丛书集成初编本）。

³ 《颜氏家训·勉学》篇。

⁴ 叶德辉《书林清话》卷十。

鱣、钱泰吉、莫友芝等诸校讎家，无一不是埋头窗下，手自铅黄，穷年累月校书而乐此不疲。我们应当感谢这些细心铢铢，反复勘对，穷毕生之力，孜孜矻矻地做着校讎工作的人，正是因为他们辛勤校讎，错谬得以纠正，善本得以重生，不但成就自身之乐，更能传绪经典、嘉惠后学。

近年来，阅读新整理出版的书籍，屡见错漏。虽说无错不成书，但心中却难以释然。我认为“校书如扫尘”，关键是要表明对待校勘的态度。任何一个出版社所出的图书，由于种种原因，绝不会达到完美无缺的地步，只是一个错误多少的问题，在这点上，校书名家顾广圻亦难免疏忽之处。现如今的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概莫能外。学界有那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引用古籍，以中华书局、上海古籍两家出版社所出的为好，因为相对来说，中华、上古在校勘方面更严谨一些。当然这也只是相对而言。任何作品都不可能完全没有错误，至少错字是难以避免的，故古人才有“校书如扫尘，一面扫，一面生”的慨叹。但我们应当将错误造成的影响降至最低，至少不应当出现相对低级的错谬，这才是我们校勘古籍的一种正确态度。古籍的点校和整理，是一个无限的过程，需要世世代代接续不断去完成。

宋代诗人朱翌⁵有《题校书图》一诗，言校书颇有韵味，姑附于此，与同好共赏：

题校书图

宋·朱翌

我闻校书如扫尘，尘随帚去辄随有。
萤窗孤坐志不分，帝虎鲁鱼相可否。
榻上诸公富贵人，安能办此铅黄手。
绿柳啼莺耳畔春，翠袖弹丝眼前酒。
如何复窥蠹简尘，又借管城公作帚。
画史画名不画实，润色丹青传不朽。
我是瀛洲旧校书，挥汗磨铅胝两肘。
当时万一见此图，诸郎不免涎垂口。

⁵ 朱翌（1097—1167），字新仲，号潜山居士、省事老人。舒州（今安徽潜山）人，卜居四明鄞县（今属浙江）。有《猗觉寮杂记》二卷。又《潜山集》四十四卷，周必大为作序。《彊村丛书》辑有《潜山诗餘》一卷。